

建“美丽中国”，当提高环保标准

社会热点

12月4日，有国际环保组织发表调查报告，称浙江绍兴和杭州萧山两个工业园区每日数十万吨毒水直排钱塘江，当地政府部门对此予以否认。新华社记者近日前往实地进行调查，发现之所以环保组织和当地政府各执一词，是因为环保标准的适用有争议，当地许多污染企业排出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并未列入环境监测“国标”，因此出现了毒水

“达标”的怪事。

“钱塘江边直径约50米的‘黑色漩涡’，蓝黑色的河水中翻滚着大量乳白色泡沫，走近排污口，还能明显感受到河水散发着热量和臭味。”就是这样的水，竟然符合国家排污标准，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它却可能是事实。

我国的水污染监测，标准局限于化学需氧量、生物需氧量、氨氮含量、PH值等指标。而近些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大规模扩张，出现了有机化学物和重金属等危害更大的新型污染物，但相关的环保标准并未及时“更新”，导致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逃脱了政策法律的管制，许多企业得以“合法”地排放这类危险物质，

而面对污染，民众却无处申诉。

中国严重的水污染现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环保的低标准。这种低标准，掩盖了触目惊心的水污染真相，使得政府部门在水污染的现实面前毫无压力感。不仅如此，这种低标准，甚至成就了地方环境治理的政绩，例如某省曾经宣布说，该省的重点污染河流近95%达标，但如果问问生活在这些河流旁边的地方民众，会有多少人认同这样的“达标”？

低标准下的水污染真相被掩盖，对公众也是一种麻痹。由于对具体细节不知情，公众对水污染的情况以及对自身健康的戕害浑然不觉。因此，对于水污染的治理，难以

形成强大的、持之不懈的公众舆论，在外部形成推动污染治理的压力。

所以，改变水污染的现状，需要提高环保的低标准。对此，完全可以参照空气污染的治理经验。PM2.5未列入国标之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一样，存在民众观感和环保部门监测数据迥异的现象，PM2.5的治理长期被搁置。但PM2.5列入国标后，情况全然改变，由于标准的严格，蓝天的政绩神话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达标的污染天大量增多，这引起了民众的关注，政府部门也倍感压力，导致PM2.5从监测到治理，迅速升温，一些地方明确提出了治理的计划。可以预料，如果完善和提升水污染控制标准，同样会带

来水污染治理的加速。

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的理念。而在环保低标准之上，恐怕永远难以建成“美丽中国”。低标准之上的“美丽”，只能是数字的美丽，与自然生态无关，与民众健康无关，如果我们沉迷在这样的“美丽”中，只能是年复一年的自我麻醉，与此同时，环境的危机，却在日复一日地迅速累积，最后总爆发。

所以，对于国际环保组织披露的水污染问题，别只顾着“辟谣”。借此，我们当反思中国环境标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拿出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污染的治理，还江河湖海以清澈，让“美丽中国”早日成真。

(转自《新京报》)

画中有话

□文/魏文彪 图/朱慧卿

12月6日晚，太原市全市公安干部大会宣布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决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免去其太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一段时间以来，网上不断传出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交警的消息，引起山西省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交警，尽管表面上是其个人行为，但是显然也与其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父亲管教不严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当前部分“官二代”之所以做出包括公然挑战司法机关

在内的诸多邪行恶举，很大程度上都与相关官员对其子女不当乃至违法犯罪行为的长期纵容有关。

部分官员在其子女借助父母身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不但不能做到大义灭亲，督促其涉嫌违法犯罪子女投案自首，反而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为其子女开脱责任、逃避制裁，并由此而使得其子女愈加狂妄肆为，做出各种引发公愤的丑行恶举。在这种情形下，对出现邪行恶举的“官二代”的官员父亲实施问责，理所应当。

要使部分“官二代”的邪行恶举得以杜绝，除了需要有关方面破除阻力，依法将其绳之以法之外，对那些子女与家人管教不严乃至包庇纵容的官员实施严厉问责，显然也是必要之举。从这个意

教子不严



以上说，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被停职接受调查，实际上也是警示所有的政府官员必须严格管

教子女与家人，杜绝子女与家人利用其权势为非作歹，否则国家与人民必将拿其是问。

末日之说，一笑便好

□余宗明

2012年已到尾声，可有些人却怕跨不过一个“时间槛”——12月21日，也就是电影《2012》里讲到的世界末日。据媒体曝，“12月21日，地球将会有连续3天的黑夜”的流言近日在多地发酵，许多市民听信流言，在集市疯狂抢购蜡烛、火柴，造成白蜡烛脱销。

“末日说”，已被科学证伪，当不得真。可如今，它却成了恐慌情绪与流言发酵的“集结号”。仅见诸报端的，就有多例：有木工念及“时日不多”，便辞掉工作，花光储蓄，到头来落得个“人活着，钱却没了”的悲催下场；有某女士偏信末日传言，坚持

要捐掉数百万家产，让家人“快崩溃了”……狗血剧情的下文，或是“后果很严重”：许多家庭矛盾、亲情隔阂也由此升级。

而蜡烛荒，也是“末日说”被引爆后的场面失控。事实上，这一出，在盐荒闹剧中也曾出现过。谣言刺激下，消费就骤增，俨然是种奇怪的条件反射。或许有人说，抢购蜡烛，是迷信在作祟：“末日预言”是无本之木，却这么有市场，跟某些人“姑妄信之”“宁可信其有”的犹疑心态，抑或“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偏执心理有关。这话看似没错，却忘了刨根问底：民本良善，是谁误导了他们的判断？

口口相传、逼真渲染，再加上集

体无意识的助推，似乎是“疯抢蜡烛”的肇因。但谣言得以流布，比传播链条更关键的，是寄生土壤。正因“末日说”契合了很多人的某种心理动因，流言在“网式覆盖”的过程中，才未被戳破。不可否认，“末日说”这颗烟雾弹，之所以能击中许多人，跟他们身处的信息环境相关联。当他们置身于梗阻的信息场，处在科普盲区，权威消息“鞭长莫及”，那么他们难免形成判断偏差。对此，填补他们的“信息缺口”，不应被忽略。

但信息淤塞，并非“末日说”甚嚣尘上的根源，否则，很难解释为何有部分“高知人群”对它执迷不悟。对“末日说”的迷信，未必是知识缺陷，也许是心态偏失使然：当有些人

精神颓靡，心中充斥着畏惧感，对被编织的“末日传言”过度敏感，也就难免想象。“知者不惑”，不能说担心末日将至是庸人自扰，可心灵的茫然失措，正是流言攀爬的梯子。对豁达者而言，就算真有异象，他们也不会自乱手脚。

当然，“末日说”制造的，也不仅仅是坏事：12月5日，成都某网络公司就宣布，给员工安排两天“末日假期”。此举是噱头也好，是迷信流言也罢，好歹给员工带来“额外福利”。说到底，“末日说”不过是一记烟雾弹，当饭后谈资可以，无需忧上心头。我们不是《2012》里的群众演员，入戏太深，影响情绪。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是大学治理的核心，是体现大学精神的灵魂人物，其声望将对大学管理、办学方向以及大学的改革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所大学能否吸引更多优质师资和生源，能否在国际化教育交流和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与大学的传统地位和办学水平有关，一定程度上也与大学校长个人的品行、声望有关。

公选大学校长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要通过公选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将候选人全面、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提升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另一方面强化他们对大学负责、对公众负责的意识，为他们施加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促使他们在当选之后，以实际行动兑现竞选时向大学和公众作出的承诺，真正实现大学以主体资格自主办学、校长以教育家身份民主治校。

既然公选大学校长的过程如此重要，下一步除了要扩大公选试点范围，还应当把每次公选的规模和影响做大，增强以公选重塑大学校长声望的效果。公选的每个环节、程序都应当向媒体和社会公开，并通过逐级“海选”、多轮淘汰等竞争性设置，强化公选活动的传播效应和辐射效应，提高公选活动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马寅初……每当细数这些大学校长的名字，我们都难以遏制内心的感怀。令人欣慰的是，在不断扩大的公选大学校长试点中，我们看到切实推进“教育家办学”的努力，看到了教育改革更上层楼的希望。

“医跑跑”的医德跑哪去了？

正在接受截肢手术的全身麻醉的病人则不幸身亡，事件引发社会对医德的热议。湛江同类事件中，医护人员还是将病人撇下不管，跑到前面。跑得比谁都快的医护人员，回头看看，你们都丢了些什么？

老实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都怕死，医护人员也不例外，只是职责所在、责任所系，决定某些人不能只顾自己逃命，置他人不理。就像战场上的战士，面对敌人的枪林弹

雨，只能前进不能退缩，贪生怕死的战士就是不合格的战士。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护人员正是这样的群体。2003年的“非典”，即使明知有生命危险，许多医护工作者也一往无前，积极投身于“抗非”第一线，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别再说在医院里发生有害气体泄漏事故，病人面临生命危险，你们有义不容辞的救人责任，哪怕在其他场合，身为医护人员，也当冲锋在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现场人员脱离险境，救助受伤人员。

数年前，“范跑跑”在地震来临之际弃学生于不顾自个儿先跑，被“板砖”拍得抬不起头。相比起来，在有害气体泄漏之际，医护人员不顾病人安危自己先跑，更让人难以接受，更应该受到谴责。当地医院，应该关起门来，好好检讨一下医德医风，不要找借口来敷衍公众，替自己开脱。